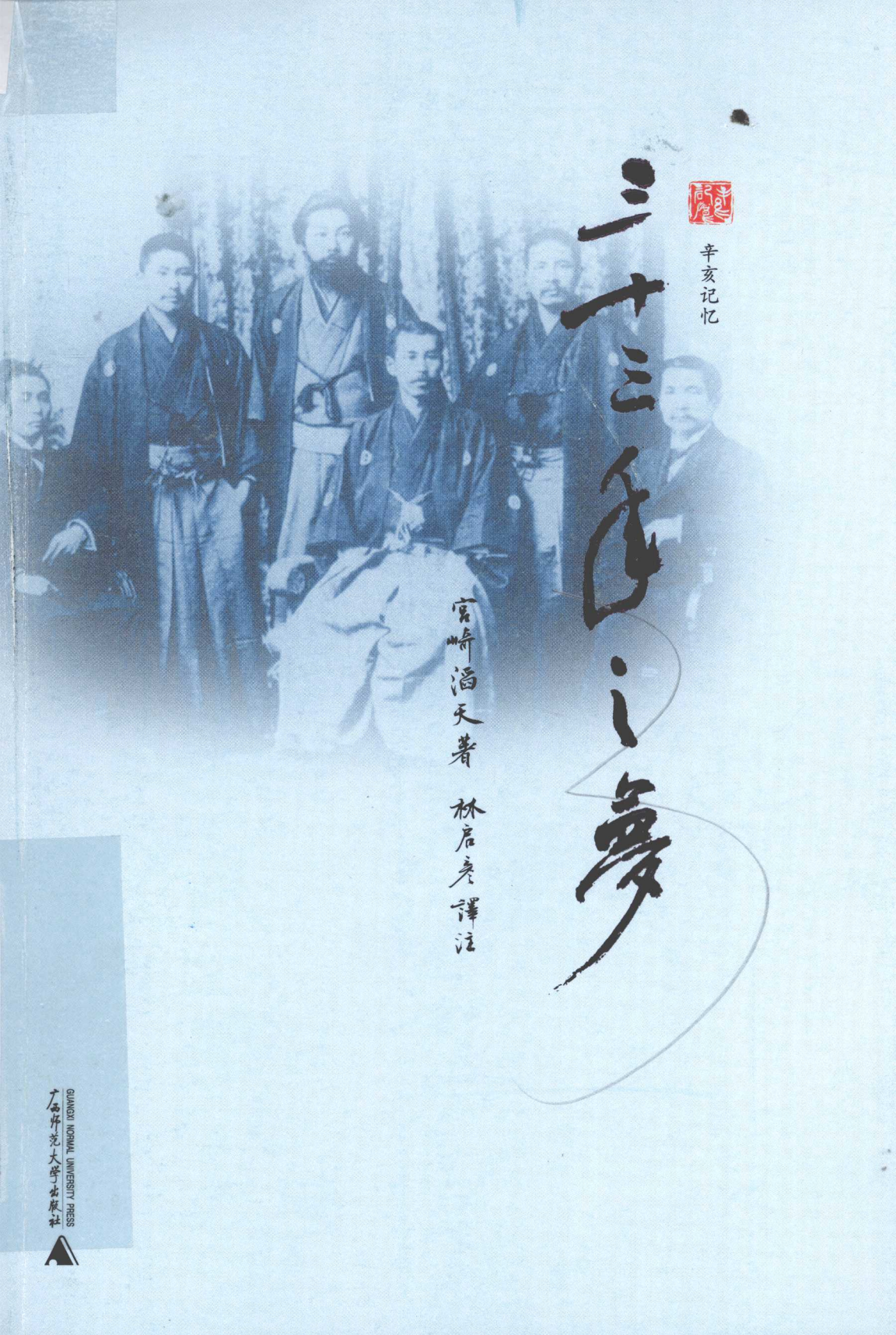




辛亥记忆

三十三岁之梦

官崎滔天著 林启彦译注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辛亥记忆

Sanshisan Nian Zhi Meng

三十三年之梦

[日] 宫崎滔天 / 著 林启彦 / 译注

· 桂林 ·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十三年之梦 / (日) 宫崎滔天著; 林启彦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3
(辛亥记忆)
ISBN 978-7-5495-0330-8

I. 三… II. ①宫…②林… III. 宫崎滔天
(1871~1922) —回忆录 IV. K833.13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918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印刷

(广西南宁市望州路 251 号 邮政编码: 530001)

开本: 720 mm × 970 mm 1/16

印张: 19.25 字数: 260 千字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8 000 册 定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新修订版序

官崎滔天所著《三十三年之梦》的中译本原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迄今已经历了三十载的岁月。此书自面世以来，一直深受中国读者欢迎，在史学界中，亦经常被征引援据。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决定重新排印本书，并列入近代中国贵重回忆录丛书中之一种，以垂久远，实为此书之幸。笔者乘此机会，得对本书重温一遍，并得仔细校订前版未及改正的错误，亦一美事也。在新版将要付梓之际，谨撰数言，以抒感怀。

官崎滔天（1871—1922）是近代中日两国民间友好交往历史中最值得怀念和尊敬的人物之一，他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近代中国革命家建立的友谊及对他们的革命事业毕生的支持，可谓最诚挚感人。

官崎滔天一生有极不平凡的经历，他的思想是超前于时代的，他不像明治以来多数的日本人，理想的追求只停留在欧化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之上，他提出支那革命主义（官崎使用支那一词，绝无贬义——笔者），要支援中国以至亚洲各国受压迫的民族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与统治，以建立一个自由、平等与和平的亚洲。这思想成为他终生奉献于中国革命活动的原动力。

为了实现他的理想，官崎滔天选择了参与中国的辛亥革命运动为其行动的第一步。对中国革命领袖的支援，滔天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由于他的努力斡旋与奔走，许多被清廷通缉的政治犯，包括孙中山、黄兴等人，获得了庇护；他又促成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会面与合作，

对同盟会的成立，起了重大作用。他主张中日提携论、土地国有、平均分享的思想，影响和启发了孙中山与黄兴等人的社会政治观。为了增强革命派在海外尤其是在日本的活动能力，他在日本政界、留学生以及立宪派之间奔走撮合，争取他们支持革命，结成盟友，而自己则甘于做中介者的角色。他为了让日本社会知道中国人革命事业的重要意义，做了大量的文字工作，首先翻译孙中山自撰的《伦敦蒙难记》为日文（1898年出版），撰写数量可观的纪实文学作品如《三十三年之梦》、《支那革命物语》、《清国革命军谈》等，尤以《三十三年之梦》影响最为深远。他还创办了《革命评论》（1906年），撰写大量的政论，以声援《民报》而大造舆论工作，为宣传革命思想及提高中国革命党人在国内外的道德形象，努力不懈。这些工作，极大地鼓舞着不少海外和国内知识分子，包括一些日本人加入革命派的行列。他在经济与军事方面给予革命派实质的援助，缓和了当时革命党人极为拮据的财政状况，帮助解决革命军火筹措的难题，所以滔天对辛亥革命可谓贡献良多。为此，官崎滔天得到了许多史家学者高度的赞誉与评价。卫藤瀋吉形容他是一位“唐吉珂德型的行动派”，近藤秀树称他是“日本的拉弗耶特”，詹逊（Marius B. Jansen）认为他是“众多日本志士中最重要的一人”，吉野作造评价他是建构“中国与日本间桥梁志士之一”等等。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国运岌岌可危，经历甲午战败和义和团事件以后，列强加紧分割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人亡国灭种的日子，迫在眉睫。处于如此危急存亡之际，中国社会上出现了两股革新力量，试图通过两种不同形式的政治运动，以促进中国的更新，救亡图存。其中之一是1898年由康有为、梁启超所领导的自上而下的温和的政治改革，欲仿效明治维新，推行君主立宪，但结果因保守派的反对及破坏而以失败告终。主张立宪改革的康、梁，被迫亡命海外，才能保住生命，致力迎救康、梁出险的，是官崎滔天。另一场是由1895年起至1911年止，由孙中山领导的由下而上激烈的政治革命，以确立法美模式的共和民主制为理想，期间的革命起义失败了多次，到了1911年辛

亥武昌起义才最终成功，推翻清朝的统治，建立民国。在这十多年策划起义的生涯和亡命海外的日子中，当孙中山事业最低沉、境况最恶劣的时候，给予孙中山有力的物质资助和精神支持者，是官崎滔天。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还，拥抱西洋文明，厉行欧化政策，脱亚入欧，国势迅速强大，摇身一变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一员，与西方列强竞逐亚洲的霸权，日本朝野正为日本这些“文明”成就而欢呼喝彩之时，对日本“文明”发出质疑，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行径加以谴责，批判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呼吁日本应回归亚洲，做亚洲民族的忠实盟友，与他们一道联合起来，抗击西方列强，争取自由平等、民主共和政治在亚洲诸国实现的，是官崎滔天。对日本政府自明治维新以来一贯的军国主义扩张侵略，予以痛责；对其对华政策一贯玩弄压制与利用的两面手法，深表不满；对大隈内阁的助袁和提出廿一条要求，以及寺内内阁的援段压南（南方革命军政府）的政策，提出尖锐批评的，也是官崎滔天。对日本军部的骄横跋扈，提出指责；对日本右翼民间团体如黑龙会、玄洋社等，以利用援助革命派的手段来谋求扩大日本在华的利权的做法，予以坚决抵制的，也还是官崎滔天。

是什么思想力量，主导滔天有这样坚强的侠义性格与独立特行的言行呢？

滔天是一位自始至终真诚拥护自由平等及民主共和理念的人。他更有一个民胞物与、人人平等的人道正义的信念。这样使他能发展出一种世界公民、世界革命的意识，以献身于全人类的自由与平等的事业。我们不妨引用他在《三十三年之梦》一书自序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他是这样表白自己的：

我深信人类有同胞之义，故对弱肉强食的现状，深恶痛绝；我信奉四海一家之说，故对现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甚为憎厌。深恶之事，不可不除；憎厌之事，不能不去，否则世界大同的理想，就只是梦想。……所以我便以世界革命者自任。

滔天希望建设的是一个“车夫马夫有车坐，穷苦农民亦富有，四海兄弟皆自由，万国和平自由乡”（《落花之歌》）的世界。

官崎滔天以他的崇高的理想、侠义的胸怀、正直的言论，与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革命志士建立起真挚的友谊，共同促进双方国家的进步，谋求世界大同，树立起中日两国民间友好的典范。对两国人民来说，这段历史尤应珍惜重视。透过本书的记述，我们当可细味其中史实的一二。

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发展，道路可谓无比曲折坎坷，两国人民始终无法建立坚强的互信和真正的友谊。我们期待廿一世纪的中日新关系，将能有所突破。廿一世纪，中日两国将更能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发展友好邦交。廿一世纪的亚洲各国也将有更大可能建立和平、亲善与合作的新关系。今日中日两国人民，以及亚洲各国人民，若能以昔日官崎滔天与孙中山等革命家的抱负和友谊为明灯、为资鉴，极力消除彼此之间的猜疑障碍，努力推动友好合作，则孙中山与官崎滔天当年期待建立的民主、自由、和平、均富的亚洲盟邦，应不会是很遥远的事吧！

林启彦

二〇一〇年六月于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退休前夕

三联版原序一

章士钊疏《黄帝魂》，对于其中所收的《孙逸仙与白浪滔天之革命谈》一文有以下的说明：“此从吾所编《孙逸仙》一书采摘而来。吾之此书，原以官崎寅藏之《三十三年落花梦》为张本，……本其一知半解之日文知识，择要迻录，成此短书。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竟成鼓吹革命之有力著述。”黄中黄（章士钊）的《孙逸仙》一书，固是撰者本其一知半解的日文知识，摘译而成，迻录既未及半，译文又多出自意度，但如无官崎的《三十三年之梦》，则亦将无黄中黄的《孙逸仙》，所以清末的这一“鼓吹革命之有力著述”，还是脱胎于官崎的原著。至于章氏所说“有江南名士金松岑，……复取滔天原著，全部精译，踵行于世”，则不尽符事实。因为我们所见到的金一的译本《三十三年落花梦》，也仍只是一种节译之本。论清末的革命宣传，《孙逸仙》一书的流传及其收效之宏，足以与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比驾。不仅如此，在同盟会成立前夕，为孙中山建立起一个有理想的民族革命家的形象，不再被当作草莽英雄，从而有助于青年知识分子趋向他所领导的革命，改变革命和保皇角逐的形势，此书也与有力也。

官崎的原著是一种自传性的撰述，其难得处乃在其叙事的真实和坦率。官崎以一个日本所谓的“大陆浪人”，参与清末的中国政治运动，书中对于他个人及其侪辈的思想、生活和行事，他们的在上的指麾者和日本政府的用心和策略，以及他所曾接触的中国人士和所曾参与的在中

国的行动，都有翔实生动的描述。这使此书在了解这时期的中日关系和辛亥前的中国革命运动上，提供了部分很值得重视的史料。该书的第一种堪称全译的译本，是一九七七年台湾中华书局印行的宋越伦先生的《三十三年落花梦》。现在林启彦先生根据香港三联书店旧藏的一份全译稿，与晚近日本学者为该书所作的校订本和注释本对勘，加以整理改译，又成此译本。我侥幸得有机会在今本出版前读了全稿，见到新译译笔的严谨忠实、内容的完足与文字的明白流畅，深为官崎的原著称庆。同时，也为国人的久知此书、过去因碍于文字而未窥全豹者能有此好译本而感到高兴。今本有林启彦先生新作的注释和添加的几种附录，其中注释和新编的《官崎滔天与中国革命编年纪要》，为全书提供有关的历史背景的知识，对读者当尤有帮助。

日本明治时期的所谓“大陆浪人”，来自没落的旧武士阶级，行险侥幸，为日本大陆扩张政策的前哨，朝鲜和中国都曾深受其祸。但以其为“江湖壮士”，所以也确有具豪侠之气、急人之急的人出乎其中。如官崎，为求东亚于西潮的澎湃下得以自存，渴望改变东亚的“旧秩序”，是有其一番豪情壮志。清末中国的革命志士，为免陷政府的罗网，多假外国租界、香港和日本等处，以为藏身、宣传和作起事的准备之地。这样因利乘便，造成了辛亥前中国革命志士和有些日本志士之间的密切的关系。官崎和孙中山的交谊，也是如此结成。但官崎之不同于其多数侪辈的，便是他一旦投身于中国革命，成为孙中山的追随者，便一心为中国的革命效力，至死靡他。在惠州起义失败后，他对自己和对革命前途失望之余，也宁愿投身浪花节卖歌为生，不受图谋不利于中国的日本侵略势力的牢笼。本书可说就是他的自述。所以为了纪念这一位曾是中国辛亥革命的忠实友人的日本志士，本书也应该有一种完善的中文译本。

今本译者林启彦先生是我多年来所敬重的一位年轻学者。我在一九六六年初来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十多年来，见到他以甲级荣誉学位毕业本科，在新亚研究所和中大研究院深造，去日本留学和学成归来，学问日进，而虚怀若谷，如有未足。王阳明以“勤谨谦抑”教龙场诸生，启

彦的治学，足以当此四字而无愧。他的专长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以戊戌至辛亥的一段时期为主，而以此时期的中、日两国的思想学术交流为重心。他的专题论文散见于港、日两地的学术性刊物。他编有《孙中山研究日文资料与著作目录》，藏广州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室。除本书外，他还和谭汝谦博士合作，译有日本实藤惠秀教授的巨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将于明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分别在京、港两地出版。

一九八一年仲春 王德昭

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文化研究所

三联版原序二

官崎滔天（1871—1922）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一生的事业，大都与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运动有密切的关系。他曾长时间地从事于襄助中国革命的活动，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辛亥革命时期的领袖建立了相当深厚的友谊，对中国近代的民主革命事业的进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三十三年之梦》是滔天记述自己前半生事迹的传记。

官崎滔天，原名寅藏，别号白浪庵滔天，熊本县玉名郡荒尾村人，出身于一个已破落的武士家庭。父亲长藏精于剑术，为人侠义，鄙薄钱财，不善治产。滔天的豪宕性格多少受到乃父的感染。长兄真乡（八郎）是自由民权运动的健者，一八七七年，因参加西乡隆盛所领导的反明治政府的西南之役而阵亡。一兄（排行第六）民藏，醉心于农民与土地的问题，曾著有《土地均享、人类之大权》一书，主张土地重新分配，反对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二兄（排行第七）弥藏，年青时代即颇留心中国问题，很早就有志于中国的革命事业。这三位兄长对滔天日后思想及志向的形成，关系甚大。青年时代的滔天，曾受业于明治时期著名的欧化派领袖德富苏峰门下，又受过小崎弘道牧师有关基督教教义的陶冶，其后更与流亡日本的瑞典籍虚无主义者亚伯拉罕（Isaak Ben Abraham）交游。虽然滔天后来都离开了他们，但苏峰所宣扬的自由主义，基督教的博爱和平等的人道主义，以及虚无主义的反权力反体制的思想，却对滔天一生的思想与性格的形成有相当深刻的影响。滔天少怀大志，早有淑世之思，对十九世纪后半叶弱肉强食的世界，极其憎厌，而

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宰割世界的野蛮行径，尤表痛恨。目睹当日亚洲国家的衰弱不振、黄种民族的沦亡无日，他曾希望日本能负起挽救之任。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急激的西化政策，使他很失望。于是，他便把复兴亚洲的希望寄托于中国的革命事业之上。从一八九一至一八九六年间，他曾一度赴华，二次渡暹，并在日本国内与朝鲜开化党人金玉均接触。这都是他为了物色志同道合的亚洲志士，以便日后在中国实践抱负所做的准备工作。一八九七年，他在横滨初识孙中山，一见而倾倒拜服，矢志追随。自此以后，他便正式开始了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艰苦生涯。

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发生后，他与平山周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到中国去营救变法派的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亡命日本。此后，他又尽力谋求孙中山与康、梁之间的政治合作。一九〇〇年，他亲身参与惠州起义的策划工作，为筹措经费与军火，多方奔走。一九〇五年，他又促成了孙中山、黄兴的会面与合作，对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做出过贡献。一九〇六年，他更创办《革命评论》，以文字声援《民报》的革命主张。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更拟亲赴武汉参加黄兴所领导的革命军。其后又参与筹划上海临时革命政府的成立。入民国后，中日关系日益恶化，身为大陆浪人的滔天，固然不易为中国民众所悦纳；作为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志士的滔天，却又不容于日本的官宪，时势和环境，都不容许他继续早年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活动。但滔天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同情，却始终不减其热诚。他对袁世凯称帝的图谋，表示愤慨；对第二和第三次革命则寄望甚殷；对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的革命党人，则力为庇护；又在舆论上大力支持南方革命政府对北洋军阀政权的讨伐。终其一生，大多数的日子都在穷困中度过。为了筹措革命经费，掩护革命党人的活动，照顾革命党人的生活，连自己的家产亦耗尽，自己的妻儿亦弃养，坚决地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奋斗终生。滔天胸怀磊落，情意真纯，确是中国人民在艰难的革命岁月中一个可贵的朋友。

官崎滔天是一个有浓厚浪漫主义情调的人。他情感丰富，但较易冲动。而对中国的革命事业，他亦抱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他认为：“与其

得三军，何如获一将。”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作风和想法，影响了不能耐心地从事艰巨的发动群众的工作。因此，当革命遭受失败和挫折的时候，他便容易陷于沮丧和颓唐的境地。不过，在大关键处，他从不苟且。当中村弥六侵吞了革命党人购械的款项时，他宁冒引起日本政潮大纷争的危险，仍主张犬养毅应对中村施予制裁。当他穷困潦倒之际，日本警察当局曾以金钱诱贿他，想收买他提供孙中山、黄兴和同盟会的机密，但他却大义凛然，报以怒斥。当他自己的家庭尚在饥寒线上挣扎的时候，他还坚持要照顾黄兴托给他的儿子一欧，为中国的革命家抚养后代。袁世凯为了要他支持南北议和，曾以巨大的利益笼络他，他却应道：“渴不饮盗泉之水”，严峻地拒绝了。他赤诚地效忠于中国的革命——同时也是他自己的理想，连犬养毅也不得不说：“滔天实在是一个微妙有趣的男儿，外务省本来是派他去调查中国革命的秘密结社的，他却变成了中国革命党的同路人，忘记了自己本来的任务，与孙文意气相投，结为一伙。”（犬养毅《孙文的回忆》，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一日《东京朝日新闻》，转引自彭泽周《官崎滔天与中国革命》）

《三十三年之梦》是滔天于惠州起义失败后，在一种经济极度拮据、心境极度愤怨的情况下写成的前半生经历的回忆录。全书分为二十八节。前半部叙述了滔天自己的家世，早年受教育的经过，他的大陆思想的产生与形成，以及早年在南洋、泰国等地的移民活动。后半部详细记录了他与中国革命活动的关系和经历，主要包括他如何结识孙中山和投身中国的革命运动，到华南去营救康、梁，运武器支持菲律宾的革命志士，促成华南、华中等地会党与孙中山的合作，以及参与策划惠州起义等事件，而以惠州起义失败后，他投身于浪花节界为生一事终结全书。从很多方面来看，本书均可称得上是一部富有价值的作品。

首先，本书在中国近代史料文献中实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尤其是本书后半部的叙事，一方面固可弥补中国文献对孙中山早年政治思想与革命活动记载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又成了中国革命运动进展中的一份传播革命思想的文献，发挥了很重要的历史作用。关于这点，需要略加

说明。在本书的出版及其中译本出现以前，孙中山早年的政治见解及其革命活动，鲜为当时爱国的知识分子所知。对于孙中山的人格与学问，中文方面更无专门的材料报道，以致孙文的名字曾引起了多种的误解。当时，有人认为他不过是一名草寇，亦有人视他为江洋大盗。但经此书的介绍和宣传，孙中山的形象在清末革命知识界中间从此改观。这对在孙中山的周围团结革命势力起了极重要的作用。由章太炎为本书的第一种译本（章士钊译《孙逸仙》，1903年）作的题词，就可得知。其词曰：

索虏昌狂泯禹绩 有赤帝子断其嗔
掩迹郑洪为民辟 四百兆人视兹册

章氏把孙中山比作刘邦，把他的事业视为郑成功、洪秀全的延续。章氏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之所以对孙中山如此推重，本书对孙中山所作的记述，自必对他有相当的影响。事实上，这个译本曾列入《荡虏丛书》的一种，成为清末最畅销的革命宣传书册之一，与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等同样风行于中国内外，影响和教育了这一代的革命知识分子。举一个例子来说，黄兴就是因读此书而得知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莫下了日后与孙中山合作共图革命大业的心理基础。

其次，《三十三年之梦》又是研究近代中日关系的上佳材料。孙中山和宫崎滔天结下的革命友谊，除了彼此之间人格作风的互相感召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二人政治理想中有很大部分是相近的。他们都认为亚洲民族要进行独立和民主的革命，才能使自己的国家摆脱被白种人奴役的命运。他们又主张亚洲所有被压迫的民族与国家应该团结起来，互相支持，为对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袭，为建立独立的、和平的和民主的亚洲而并肩作战。孙中山和宫崎滔天，作为中日两民族的代表人，曾为此理想而共同奋斗。他们所奉行的亚洲主义，和后来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滥用和乱用的“大东亚共荣圈”之类，其本质和精神都有所不

同。而《三十三年之梦》为孙中山和宫崎滔天的亚洲主义的理想及其实践的模式，留下了当时最宝贵的记录。在《三十三年之梦》中出现的日本人，十之八九是所谓大陆浪人。其后大多数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政权蹂躏亚洲的工具。滔天由于革命的需要，或曾因某个时期彼此间的志同道合，曾和他们有过若干的来往和合作。但当最紧要的关头来临时，滔天就毅然与他们决绝。他和萱野长知、山田兄弟等始终是中国革命的可靠朋友；而内田良平、头山满之流，则终于成为中国人民所憎厌的敌人。滔天的一生，总是从亚洲民族的利益和中国革命的立场来考虑问题。所以黑龙会后来要排斥他，日本政府要监视他、打击他，使他连一个县的议员都竞选不上，连政府一个最普通的职位也无法得到。可是，他却在中国革命家和政治领袖中博得普遍的信任和敬重。举一个例，一九一七年当滔天到湖南长沙参加黄兴的丧礼时，当时还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的毛泽东曾致函滔天，对他称许说：“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插图页）所以，要研究宫崎滔天的人格与思想，固然不能忽略本书，要了解近代中日关系中友好一面的历史，也应该重视本书。

最后，《三十三年之梦》又不愧为明治传记文学的一种代表作。由于这是滔天早年生涯的实录，而他又毫不隐讳地把自己性格上和行为上的弱点和自己生活周围的大小事情如实地描述出来。因此，这就更能帮助读者认识明治时代青年的精神和心态，以及明治时代若干社会问题，如封建主义教养的崩溃，农村的破产和武士阶层的没落等的实象。吉野作造形容本书文字简洁、描写生动，又指出：“本书最大的历史价值，乃在于它没有虚饰的实实在在的记录。”（吉野作造《〈三十三年之梦〉解说》）

事实上，在桑原武夫主编的《日本の名著》（中央公论社，1974年）和官川寅雄、家永三郎、远山茂树等合撰的《日本近代の名著》（每日新闻社，1966年）等书中，均已把本书收入名著之列。足见本书

确是中日两国所应共同珍惜的文献。

《三十三年之梦》单行本正式出版（1902年）的翌年，我国即有章士钊（笔名黄中黄）的摘译本面世，同年又有金天翮（笔名金一）的全译本。前者仅译出了原书关于孙中山的记录的部分，篇幅上不及全书的五分之一。后者虽是全译本，其实仍不过是粗略地摘译而已，错译、漏译、乱译的地方，随处可见。民国以后，虽曾出现过几种译者名称不同的译本，但其实都不过是金译本的改头换面而已。六七十年间，中国竟无一部完整而忠实的译本，实在是一件值得遗憾的事。到了最近，台湾中华书局出版了宋越伦所译的《三十三年落花梦》（1977年）。这应该是中国的第一部全译本。宋氏功劳，自应肯定。但宋书的译文，仍有甚多可以商榷之处，与信、达、雅的理想标准似乎还有一些距离。由于该书文、白两体的杂用，叙述与对话的不分，使原书清隽逸脱的风格，荡然无存。而最令笔者感到不妥的，还是译者过于轻率地背离原著的内容而自造文义。就此，笔者但举一例，以资说明。

原著是：

“余は此に至つて幾度か‘憂しと見し世ぞ今は恋しき’の嘆を漏せり。窮屈なる不自由郷となせし大江義塾も、自由民権の詐偽漢と思ひし旧同窗生も、今は屢屢自棄の卵子の夢懷に入れり。”

（《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页34）

宋书译为：

“于是我始知……，所谓一蟹不如一蟹，不见世情的诡谲，不知故乡之可贵，过去认为‘不自由乡’的穷蹙的大江义塾，以及自由民权的伪君子的旧时同窗诸君，至此乃经常成为我梦魂所寄的最大憧憬。”

今本译为：

“到了这个地步，我不知多少次兴起了‘浮世昔所忧，今也犹怀恋’的慨叹。昔日使人感到穷蹙的不自由乡的大江义塾，以及看来是一群自由民权伪君子的老同学，如今却常成为我这自暴自弃的

后生小子的梦怀所寄。”

香港三联书店原藏有《三十三年之梦》的旧译稿，所根据的版本是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东京文艺春秋社出版的一种。该书出版时，由于政治因素和社会条件所限，曾对原书做了颇多的删节、讳饰和改动，使原书的本来面貌受到较大的破坏。至于译文方面，这译稿又似乎是一份集体合译的初稿，叙事、译名、遣词、用字等均未经最后的统一修饰，而错译之处亦复不少。为使本书能有一个较佳的译本，笔者遂以此旧译稿为基础，对照了小野川秀美、宫崎龙介合编的《宫崎滔天全集》（东京，平凡社，1976年）第一卷所收《三十三年の梦》的最新校订本，重新加以订正和补译。并且在必要之处加上译注，使读者对书中所叙的人和事有较深入的认识。这些译注主要是参考了岛田虔次的《〈三十三年の梦〉注释》（《宫崎滔天全集》第五卷所收）和宫崎龙介、卫藤藩吉校注的《三十三年の梦》（东京，平凡社，1967年）书末所附的《人物略传》和《注》，剪裁修订而作成的；间中亦有笔者个人查考所得，是否有当，仍希各方专家前辈指正。书后的附录选载了笔者所译宫崎龙介《先父滔天的一些事迹》和笔者所编的《宫崎滔天与中国革命编年纪要》两篇文献，希望有助读者更进一步理解《三十三年之梦》一书相关的历史，以及宫崎滔天的为人和他与中国革命的密切关系。

本书由动笔至定稿，费时经年。中间固然遇过不少翻译上的困难，而工作条件之差、精神上的苦恼和压力，实令笔者当初不敢想望这件工作最后可以完成。如今捧读全稿，恍如南柯一梦。为此，我特别要感谢内子林洁明女士，因为她使我这个需要安静工作的人有更多安静而愉快的工作时间，更为我潦草的译订稿誊抄一遍。而稿成之际，又蒙业师王德昭先生悉心细阅，指正了不少错误；并允赐序，感铭尤深。付梓之时，复得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师谭汝谦先生，以及陈湛颐、周佳荣和陈万雄等几位学友的宝贵意见，使本书若干缺点得以纠正，谨此并致谢忱。

林启彦

一九八〇年十月